

贺卡、笔记本与田野伦理反思

熊星翰

一 偶遇

“先生，买一张吧！”

“我也有，一次买五张，给您再便宜点儿……”

“我这儿也有！”

一群孩子将我团团围住，向我兜售自制的贺卡，贺卡是手绘的简笔画或者树叶贴画，内容大抵是狐猴、变色龙、田间地头的生活场景这一类外国游客可能感兴趣的东西。

这里是马达加斯加中南部山区城市费纳兰错（Fianarantsoa）老城区的中心广场，附近的小巷子有我预订好的民宿，接下来一周我会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察。此刻我刚结束一天的长途汽车旅程，在最后一抹日色褪去前钻出狭小的车厢，重新站在了大地上，本以为可以快速找到旅店卸下疲惫，却没想到出现这样一段小小插曲。于是只好收摄心神，开始应付眼前一双双略带焦躁又饱含期待的眼睛。

看我迟迟没有作答，孩子们继续推销：

“先生，买点儿吧，一张也行。”

“是啊，买一张吧，我们还得交学费。”

交学费的说法触动了我，看着眼前一个个瘦小的家伙，心中惻隐油然而生。随即也没有太讨价还价，从几只小手中接过卡片，然后一一把钞票递给他们。

[收稿日期] 2021-09-30; [修订日期] 2021-12-30。

[作者简介] 熊星翰，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洋南部地区。

也许是将我的举动解读成了有钱人在播撒同情心，那些没有能够被选中的小伙伴变得更躁动了，像争抢食物的雏鸟般冲我挤来，并且尽量伸长手臂。同时还有更多小朋友拿着相同的贺卡，从广场边的阴影中跑出，让局面更加混乱。

好在与我同来的当地朋友已经找到了去往民宿的路径，于是我一边挪动步伐，一边向小朋友们保证我第二天还会再来。但小伙伴们还是不停不休，一直缠着我到了我下榻的民居门口，眼见我再也没有出门的打算，他们才悻悻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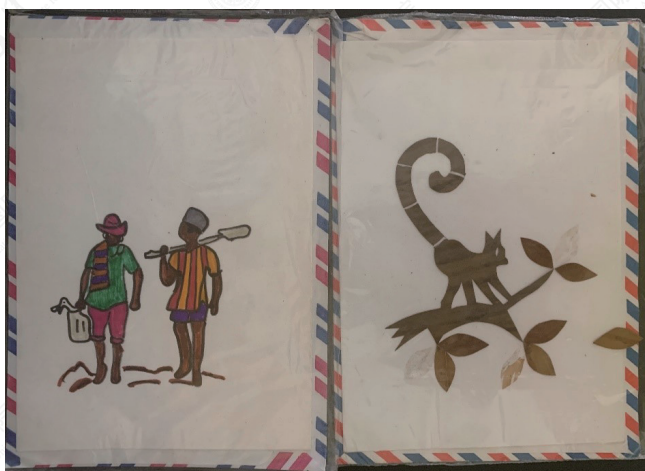


图1 孩子们兜售的贺卡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吃过晚饭洗漱完毕，我望着昏黄灯光下那一叠贺卡出神：刚才没怎么讲价，现在想想这些贺卡也不便宜呀，差不多合人民币两块钱一张。对于马达加斯加外省的消费水平而言，一次卖出好几张贺卡的孩子无异于发了一笔小财，他们真的会用这些钱去交学费吗？于是我决定明天要想办法先打探一番。

二 试探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出旅店，就看到巷口有小小的身影探头探脑，在见到我后发出一声喊叫随即转头散去。一定是小朋友们的哨探在侦测我的行踪吧。果然，当我再次来到昨天的小广场时，感觉整个古城的小朋友都已经闻讯而至，在那里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了。看到我出现，人群中有按捺不住的一两句惊呼：

“他在那儿！”

随后整个部队就向我围拢而来。

有了心理准备，我双手合抱胸前静静等着，同时暗暗认准了队伍中率先走近的两个带头小子。

“先生，您答应过还要买我们的贺卡的……”

其中一个向我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个约定的期待。

“当然，我会买的，但是我没有说一定是今天早上买呀。我是来这里做研究的，会待上一个星期，你们急什么？”

我的回答让整个队伍一怔，这和他们对我旅客身份的预判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我于是借机说道：

“这样，今早我想先在周围走走，需要雇两个导游给我介绍一下这座古城，你们谁愿意来呀？”

对于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文化遗产的山顶古城来说，导游带着外国游客参观游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笔远高于贩售贺卡的经济回报。果然，孩子们立刻忘了贺卡的事，几个反应快的马上举手报名，刚才我已经观察好的两个带头小子当然也在其中。在一番假装踌躇后，我让他俩带我走。

随后半天的游览过程里，一边听他们跟我讲古城的历史，一边我也在不断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其中小 A 的身世让人特别印象深刻。

小 A 上初中了，但身型个头却还像个小学生。他和几个兄弟姐妹生活在老城里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没水没电，父亲早已不知所踪，

母亲在遥远的地方给人当保姆和做保洁，每月有 5 万阿里亚里（约合 100 元人民币）的收入。小 A 和兄弟姐妹们基本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到了适学年龄就进收费低廉的公立学校读书。小 A 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城南 30 公里外的小镇，去参加足球比赛，拿了冠军，但是奖金分到每个人手上还不够来回的路费。除了足球，小 A 还喜欢到城里的电子游戏室看别人打游戏，龙珠、街霸什么的都知道，但是很少玩，因为对他来说太贵了。

毫无疑问，对小 A 而言，金钱匮乏是萦绕他生活的主旋律，但是这也无法阻碍他体验娱乐、追求新事物的天性。虽然小 A 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告诉我梦想前往的国度是意大利（“因为我猜那里没小偷！”），但是商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也同时将纷繁的物品和外界的信息带到了这座山区小城。小 A 穿着一件梅西的巴萨客场球衣，一条深色破洞牛仔裤，打赤脚，染黄了脑袋左侧的一丛卷发，布满血丝的大眼睛既有少年的活泼，又似乎带着几分流浪酒鬼才有的潦倒。

我不禁又想起孩子们兜售的贺卡，他们拿到钱以后，会不会去打电玩呢？或者甚至是拿去抽烟、喝酒、烫头？看来我得想想办法……



图 2 穿着梅西球衣的小 A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三 转折

当我再次被孩子们包围时，我向他们宣布了新的交易规则——贺卡换笔记本。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你们说卖贺卡的钱要拿去交学费，那我就直接用学习用品换你们的贺卡吧。于是在刚刚游览回来的路上，我在广场边的小卖部里买了十来个崭新的 16 开笔记本。交钱时想着那帮孩子再也不可能拿它们做别的事情，不禁沾沾自喜。依稀还记得小卖部老板大叔冲我嘿嘿一笑，似乎也在鼓励我智商在线的善举。

面对我的新提议，孩子们居然没有任何犹豫，爽快地接受了物物交换，并在转瞬间就将十来个本子交易一空。拿着又一叠贺卡回到住处，我隔了半晌还是没缓过神来——这帮小朋友真的这么好学上进？这不符合我对这个年龄段的认知呀，也和我当年还是小朋友时的想法不太搭调，奇怪。

带着满腹狐疑，我决定再出去走走，刚出门又被几个小家伙黏住了：

“先生，还有本子吗？我们刚回来，错过了刚才的事，我们也可以换的！”

“我现在没有本子了，再等等吧。”

我回答着，心头疑问更盛，就在这时，远远望见广场边卖本子的小卖部里跑出来两个小孩儿，好像早些围住我的队伍里也有他俩。他们看见我似乎也吃了一惊，忙把手插到裤袋里，同时扭头跑开，留下一个害羞又带着狡黠的微笑。

这微笑和先前小卖部老板的笑容交叠在一起，我猛然醒悟：新本子可以卖呀！店家高价卖我，我带着好心换回几张没多少成本的贺卡，小朋友转手再把本子打折卖回给店家。换言之，这一来一去间，本子和贺卡间的差价就被他们双方合伙赚走了。

复盘完整个过程，我哑然失笑——看来不止城市套路深，只要存

在交易体系的地方，外来者想要适应当地算法都需要时间和学费呀。

念及此处，我匆匆打发走身边几个还在尝试和我换本子的小伙伴，回住处躺在床上发呆。最终，我又起身去老地方买了十多个笔记本，决定换个思路进行最后一次尝试。

再次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我宣布还有最后一批笔记本，会换给那些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过本子的人。

人群又躁动起来，有人边往前挤边大声说自己还没有得到过，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旁边的人指责在撒谎。最后有十来个孩子站定在我跟前，攥着手中的贺卡等待交易。我随即开始发话：

“这次我不要贺卡了，我想到一种别的东西，你们拿它来换。”

小家伙们的眼神里充满疑惑，纷纷问我要什么。

“要一幅你们自己画的画，画自己的家庭，然后在背后写上几句话——描述你们到目前为止最快乐的时刻。”

孩子们还是有些摸不准我的想法，但很快纷纷表示没问题，甚至几个性急的已经伸出手来要拿本子。

“本子现在还不能给你们，”我说：“我离开这里的前一晚，你们拿着画好的画到我住的地方找我。对了，还有一个要求，带着画来换本子的时候，要先在本子的第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

有些孩子似乎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这样就没法再卖回给小卖部了，眼神黯淡下来；也有一些思索片刻后表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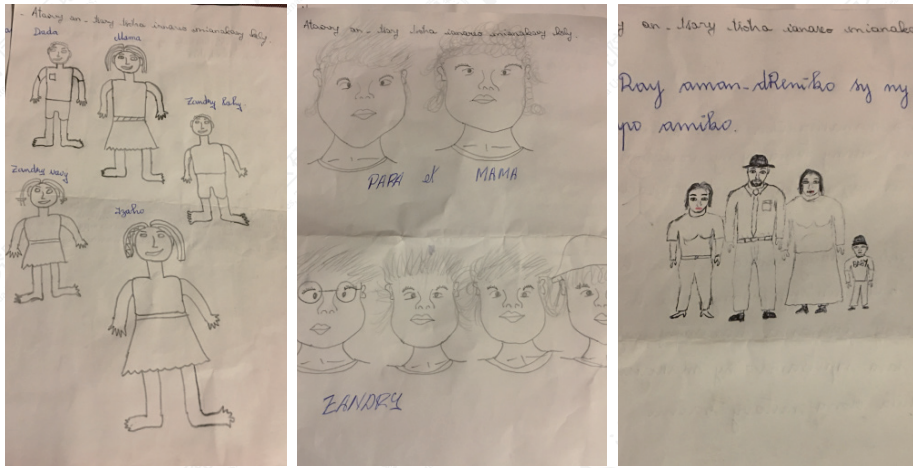


图 3 部分孩子的画作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转眼间到了临行前的晚上，先前的曲折让我对最终结果并不是充满乐观的期待，而更多抱有的是在窘境下一种自嘲式的坚持。

“熊先生，外边有小朋友找你，好像是来换本子的。”店家的女掌柜来告诉我。

“哦？人多吗？”

“好几个呢。”

“请他们进来吧。”我有点诧异。

话音刚落，几个孩子如一阵风似的冲进院子里，叽叽喳喳连说带笑。他们把画给我，略带羞涩，可能是向陌生人呈现内心时的不安，随即认真地在笔记本内页上准备签名。

“那个……签名记得用圆珠笔。”

我递出准备好的圆珠笔，尝试为防止笔记本被转卖最后上一道保险，也以为孩子们对这个要求会有所失落。但没想到，所有签名的小家伙都镇定而迅速，既像是早已对我的行动有所预判，又似乎已经习惯在生活中做出类似妥协。

最终，十来个小朋友陆续进入旅店，开心地用画作换走了笔记本。



图4 拿到笔记本的孩子们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余韵

在以人为对象的科研工作中，“避免伤害”是最基本的一条原则，田野工作作为社会科学工作方法的一种，当然也需要遵从这一准则。但在这基础上，随着田野进程的深入和研究者与当地社会羁绊的发展，其实很多田野工作者有意无意开始尝试为相关社群“做贡献”，以一种介入性方式去回馈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一旦介入并尝试对当地人群施加积极影响，哪怕心存善意，也很可能面对田野境况难以预料的后继演化和复杂的伦理牵涉。尽管我投入到购买贺卡和笔记本中的资金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却也在马达加斯加宁静的山城激起一阵不小的骚动。从旅途后下意识的善举，到后续与孩子们带有实验性的博弈，我尝试着引导资金的流向，让它去往我认为合适的地方，却最终发现这种想法或许只能很有限地达成。并且随着资金注入越多，牵涉到的当地人群越广，我无法预料和把控的因素也会迅速增加，产生更多后续演化的可能性，在我的内心留下更深的伦理负担。

毫无疑问，自己关于贺卡和笔记本的轶事还远远谈不上对当

地社群的深度介入，但其中的转折与牵连还是让我感触良多。收拾行李时看着孩子们的作品我在想：或许我自认为看破的“把戏”只是自己的臆测？又或许有孩子拿笔记本换钱是真的有急需花钱的地方——比如求医问药？又或许即便他们再也没办法转卖签过名的本子，但确实可以省下本来需要买本子的钱而去买其它东西？这东西又会是什么呢？一次探亲的路费，一袋心仪已久的零食，一瓶招来车祸的酒？

这个小小事件蕴含的可能性早已超脱了我的把控，我唯一还能确认的，只有在反思整个事件进程中所收获的自我质疑以及对复杂性的切身感受。如果抽身事外，以生活经验的普遍性为出发点，那些小小的笔记本大概率只会是孩子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涟漪；但亲自与他们相处、交流后，他们对一本笔记本所灌注的热情，又不得不让我想起洛伦兹的蝴蝶翅膀。这个田野过程中小小的插曲也加深了我对于发展援助的思考——对于任何一个社群的介入性援助而言，只有尽可能充分了解当地社会的运作机制和文化特性后，才有可能让援助项目在实现既定功能性目标的同时，将不良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

比如面对一个需要跋涉很远去河边取水的村庄，出于好心为村民们在村里打一口井，如果不注意井的位置和村里的权力结构，很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水权纷争。为一个依靠香蕉种植谋生的社区改良香蕉品种，如果新品种香蕉的收获时节发生改变，即便最终它的单位产量更高，相关人群还是很可能因为需要调整自己的经济收入窗口期而产生严重的生活困难。

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舞台上浪漫的想象值得传唱，但善意的播撒和实现，还需要更多在田野中的探索与耕耘。

责任编辑：李宇晴
文字审校：王 琴